

张宗祥整理、校勘古书的简介

张 珏

在陈云同志关于整理古书讲话的鼓励下，想起父亲张宗祥生前几十年从事古书的整理、校勘，作这篇反映事实的介绍。

父亲三十二岁时，点读二十四史完毕，遇见刘子庚，见到刘父所校四史，深知读书应先讎校，过去所事校勘，未够精确。三十三岁，到北京，在当时的教育部与鲁迅共事，父亲派在专门司，鲁迅在社会教育司。其他的朋友也相继到京任教。按照父亲的话：“旧友云集，有书相假，有疑相质，为乐殊甚”。

他和鲁迅都爱古书，趁每年去国子监祭孔之便，相约同往大方家胡同京师图书馆（即北京图书馆前身）看古书。一次，两人同为祭孔执事官，相约早去，先到图书馆看书，指着排印的善本书目发议论。不意，被教育部长傅增湘听到。傅隔了两天，召见父亲，要他“办京师图书馆”，而且要编好善本书目。父亲一再辞让。傅又召鲁迅催促。鲁迅笑着对父亲说：“你真是木瓜，如此宝山，何以不去开发？”（他两人在杭州时，同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书，一起参加反封建顽固的夏震武监督而罢教。夏被称为木瓜。罢教胜利后，二十五位教师合影。父亲在合影上，题写“木瓜之役”等。二十五人从此见面，也互相称呼某木瓜。）父亲以大方家胡同四面有居民居住，万一火警，无法抢救珍本，提出先做一人能扛的书籍，将珍本存入，以防万一，还提出招请三、四技工补修古籍的脱线、残破、裂口、虫蛀。鲁迅又笑着说：“这两件事确是当务之急，那有做不到的”。（当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管图书馆，正是鲁迅管的。）鲁迅要父亲录《说郛》和《嵇康集》。他说：“你是‘打字机’

……”（父亲能日写小楷一万五、六千字。当时的朋友称他为“打字机”）。父亲答以二个月缴卷；从此，钻入古书堆里，日拭灰尘，整理古籍，编了善本书目并照鲁迅的主张，写了两本，一本存北京图书馆，一本现在浙江图书馆。

父亲三十五岁，校《资治通鉴》，“见秦使大良造伐魏，胡氏注双百字，考订为必是商鞅，后得蜀宋本，方知原有二字刻本偶脱，乃知胡氏元人所见，已非善本，而读书贵精校，又须得善本。自此乃益用力于讎校及搜抄善本、孤本。是年抄本已积三四百卷矣……”。四十岁，“时欲抄校古书毕一生之业，故有联曰：分明去日如奔马，收拾余年作蠹鱼”。四十六岁，“寓沪上，日事抄校，得刘君翰怡所藏查东山先生《罪惟录》，乃知根据庄氏明史而成，惜为书贾割裂颠倒，遂整理抄录此书”。还“成高注三书异同證”。五十一岁，“……时汉上书友则有徐行可……相聚颇乐，手抄之书亦日富”。五十三岁，“……寓北京翠花街……与傅元淑先生邻近，又得向北京图书馆借抄珍本……。成《铸鼎录》一卷”。五十四岁，“仍寓北京，所搜得乡里逸书如《为可堂集》、《浮云集》、《花近楼丛书》等至夥，皆抄装成帙，可二巨箱”。五十六岁，“予向注力于王充《论衡》，历较宋元各刊，略为完备，一二八以前，手写全书及校刊付商务印书馆上石，私意体例及考订，较《洛阳伽蓝记》为完善。《伽蓝记》南面四门虽足证如隐堂以下各本三门之误，然记注究不便分，且属小品，故《论衡》一书，聚精力以赴之。不意《伽蓝记》早经行世，而《论衡》写完本竟为日寇炮火所毁。嗣后重写一部付周生转

交商务印书馆。周生因事涉讼，不知踪迹。书稿亦不复可问。至汉之暇，因搜集各条写完校勘记六卷。予戏语知友曰，予将集我各书成一丛刊，名曰冷书”。五十七岁，“……抄书仍不辍……”。这时，已抄校古书六千余卷，“大概有书可借可抄，日得一卷。影抄者三日得一卷。倘书主追索甚急，则夜以继日，约得二万四五千字，但性执，非手抄者不愿也。同其事者，为赵君慰苍”。

六千余卷手抄本，抗日战争时，有为亲友保存在上海的，有为当时中央图书馆运往后方的。运往后方的，抗战胜利后，装在木船上，由三峡而下，船到中途，连书一起沉入江底。解放后，整理编目，仅存二千余卷，现由浙江图书馆保存。（编有《铁如意馆手钞书目录》）

父亲担任过北京图书馆、浙江图书馆两馆的馆长，看到的古书很丰富，抄校的书有善本、孤本，来源来自图书馆、故宫博物院，藏书家、专家学者、亲友稿本等。八十四岁，患肺癌病危，还念念不忘完成《明文海》的抄校（《明文海》是他最后抄校的古书）。他精于书法，影写的书，甚至乌丝栏之类，也出自亲手。宋版书，在影写时，使抄本包括版式、行款、字数和原本一模一

样。残缺不全的，则缺佚补缺，加以校勘。凭他所编的善本书目，可以找到什么书散失或流往国外，而他的抄本可以补入。

他抄校的古书已出版的有《说郛》、《罪惟录》、《越绝书》、《洛阳伽蓝记》、《国榷》、《山海经图赞》、《三辅黄图》、《吹剑录全编》等。

另外，他为浙江《文澜阁》补缺，曾奔走募款（只募浙人的），委托学生堵申甫组织人力向北京补抄，历时两年余，抄得缺书二百一十种，四千四百九十七卷，二千另四十六册，并重校丁氏抄本五千六百六十卷，《文澜阁》四库全书始得臻于完整。书签，全部是他亲自书写。在抗战时期，他关心《文澜阁四库全书》的安全转移和运回杭州，并担任该书保管委员会主任。临近解放时，国民党中央图书馆，有把这部四库全书运往台湾之说，父亲以外交辞令对答：“你们要问过浙江父老”。（现在，这部全书由浙江图书馆保存。）

以上是简介父辈治学的毅力。最后，附父亲抄校古书的图片于后，以供学者参考。

注：有“ ”号的都是父亲《年谱》中原话。图片附后。

附：整理古书序言摘录

一、越绝书序：

……宗祥世居海盐狮山，则为武原之乡。清初迁居硖石，则在就李之南；固越民也。壮岁之后，从事仇校。屡经丧乱，奔走流离。手写之书，失亡太半，存者二千数百卷而已。今年七十有五，幸际明时，大同之盛，灿然在望；然双目已花，神气日耗，继此之后，或者仅能策杖逍遥于和风旭日之中，不复能伏案作书，整理古籍乎。越绝书

曰，绝者绝也，殆不继之意也。因亟写完此书，以供覆瓿。

丙申清明前一日海宁张宗祥记

二、校注晏子春秋序：

……一九六十年秋，予年日老，体日衰，灯下不能繙检卷册，颇思结束校仇考订注释之业。自明岁起，专从事于书画，乐余年于大同之世。故欲以此书结之。书中校改注释，皆出一人私见，且老而善忘，读者幸

谅而教之。

海宁张宗祥记于杭州时年七十九

三、大小戴礼结合纂序：

……予怀合纂大小戴礼记之心，积四十年。终以奔走不遑，未能从事。解放之后，即来杭州，任省图书馆职务。从公之暇，忙于整理谈孺木先生国榘稿者，几及三年。疏释神农本草经，三年有余。编纂全宋诗话，又三年有余。订定手抄书目录，第三次写定校注王充论衡，又一年有余。此皆积稿既久，年已七十以上，万不可缓之事。夏日挥汗，隆冬呵手，朱墨纷陈，未敢稍辍。九女在旁，时加劝阻，甚或故报有事有客，冀老人略得片刻休息。我生有涯，岂敢耽逸，然二记究以无暇，仍不能措手也。一九六一年春，姜亮夫过寓，道及此事。且告之曰，明年我已八十有一，颇思专作书画，以乐余年。万不得已，医药之事，偶一为之。至于仇校整理古籍，拟不再问。惟此事未了，不知兄能代结此案否。亮夫慨允，余心泰然，其后亮夫目疾日深，不能披阅书籍，寻医求药，迄未收效。一九六二年，春夏之交，自北京开会归杭。暑期之中，亦未赴莫干山，黄山避暑，专在寓中，偃息静念，亮夫即日

☆

父亲手抄古书是为了整理古书，使不失传。这项工作常在凌晨上班之前，中午休息时间和夜晚进行（他在京师图书馆兼任坐办时，将由故宫撤出堆积如山满是灰尘的古书，亲自整理，手编目录），借到孤本或绝本书时，通宵达旦地抄写，争取早还借书（母亲从事缝纫陪伴）。星期日友人来访，他边谈边抄。抄书的功夫，到了摆棋谱的形式，有时打开一页古书，从页的中心先写上几个字，然后从这几个字的旁边布局，能一字不误，有时先在一页的四角抄写几个字，然后像下棋似

愈，恐亦不能以此累之，使用力于不急之务，况仍未愈。于是攘臂下车，又跃跃然欲为冯妇矣，然又惧精力之不支也，乃先写此序言及目录，万一废于半途，后世或有同心好事，欲合纂大小戴二记者，亦可作为涓滴之助，古人后人，当能鉴我乎。

四、校注论衡序言：

宗祥幼病足，体弱不能步履，十二岁始跛而出就外傅，诵大学中庸。十五岁毕尔雅论语孟子易诗书礼记春秋二传，此皆应试必读之书也。好诗与左氏传，独不喜朱熹诗注，郑卫声淫，诗岂书淫，何淫奔之诗，十而七八也。戊戌政变，年十七矣。双山书院中购书如柜，供人阅读，余与蒋君百里，散课之后，即趋其中阅之。二人外无他人，庄列离骚四史，争阅不释手。四五月后，书尽，索然而返。积书院膏火之资，购王谟刻汉魏丛书，抱归，灯下遍究大概，得论衡，心喜……今年夏末，本草经新疏清稿之后，忽有所感，复出旧稿手缮之。自国庆之后，迄今两阅月矣，目昏夜不能书，年衰不能速，党与领导优待老人，无微不至，而老人报国之力，不能多而且快，可愧也。

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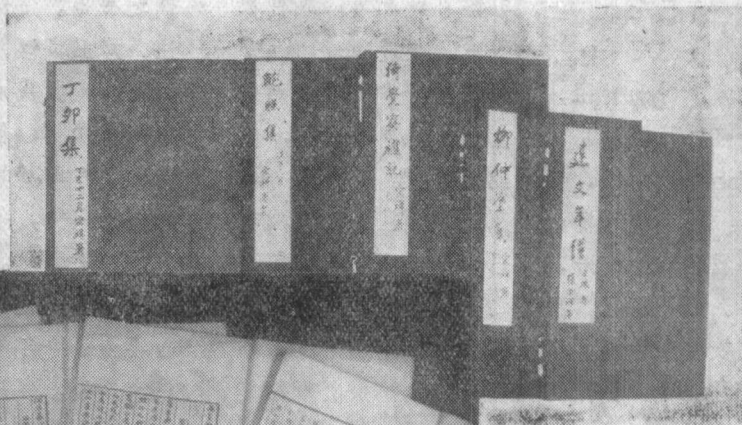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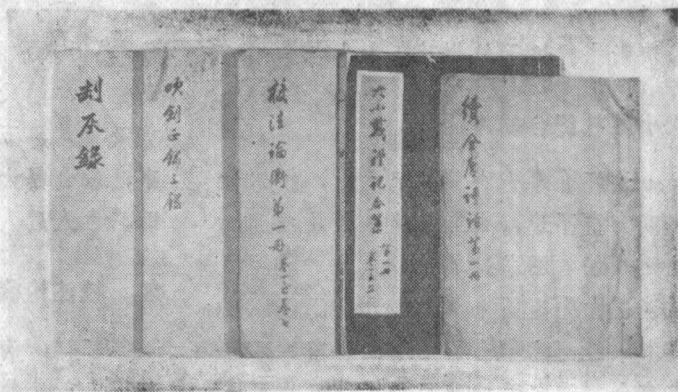
地布局，一字不错。手抄古书经他校订的都注上案语。这些案语，都务求实事求是地注写，他说：“做学问，就是要实事求是”。

他一生之中还关心着浙江图书馆，曾为该馆《文澜阁》补缺，节省工资和奔走募款，请人到北京长期住在海昌会馆抄写四库全书中《文澜阁》散失的书。他也关心浙江西印社，认为西泠业务与学术有关，影响到日本和远东；因此，生前建议复社。（父亲是复社时第一任社长。）

——摘自《纪念爸爸》序

张宗祥先生 抄校的部分古书（书影）

张宗祥先生抄校的古书在《铁如意馆手钞书目录》中，有详细介绍。（《目录》分经、史、子、集部和丛书几类来作介绍的。）这里是他的部分抄校古书如《刳灰录》、《吹剑正录三录》、《校注论衡》、《续唐诗话》等封面和《酒经》、《世说新语》等抄写字体的图片。从这些图片中，可见他抄校古书的毅力和功力。在抄校的古书付印之前，他总是再事校阅才交出版社。



图片中，《酒经》、
《世说新语》、《群经音
辨》等是影写的。

